

中國經濟特區成敗： 1980年代中期的辯論與抉擇

• 王 碩

摘要：以深圳特區為代表的中國經濟特區在其創建階段的1980年代中期，經歷了一場關乎成敗的大辯論，黨內外、海內外各種評說風起雲湧，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史上重要事件之一。大辯論以及相關的政策抉擇，是在1980年代中期中國宏觀經濟決策一變再變的形勢下出現的，以往有關著述多着眼於總結經濟特區一時一地的實踐並評價其得失，不能說是確切之論。實際上，這一場辯論助推中共中央及時調整經濟特區方略，進而對中國改革開放發揮積極作用。本文廣羅文獻，以跳出經濟特區看經濟特區的視角，對這一事件予以新的闡釋。

關鍵詞：改革開放 經濟特區 鄧小平 外向型經濟 深圳

繼1980年代初中共黨內關於辦經濟特區有無馬克思主義理論根據、經濟特區有無可能變成新租界的討論之後^①，1980年代中期海內外關於以深圳特區為代表的中國經濟特區成敗的大辯論，是又一次影響深廣的思想交鋒。這一大辯論以及相關的政策抉擇，對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對這一重要歷史事件，已有的文獻缺乏詳實準確的記載，也沒有平衡中肯的評價。

數量龐雜的相關著述中，不少著者沒有校核個別文獻，以訛傳訛^②；或者對關鍵史實張冠李戴，有關評論自然失當^③；或者拼接前後觀點不一的材料，邏輯有矛盾^④；或者把原本是大辯論期間被深圳領導人據理駁斥的非議變為正面批判武器^⑤。眾多著述在列舉特區建設失誤之處近於雷同，因為它們或多或少依據了大辯論後期有關部門關於經濟調整的教訓總結^⑥。在筆者看來，這一總結存在不足，因它僅僅局限於深圳一時一地的實踐；如果放到1980年代中期中國宏觀經濟決策一變再變的歷史背景下看，不能說是確切之論。本文以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視野，廣泛參詳各種文獻，重新梳理這一場經濟特區成敗辯論及其政策抉擇的基本史實和發展邏輯，期望有助於澄清是非之論。

一 海內外質疑和國內經濟緊縮下的特區

中共中央於1979年7月開始決定籌建深圳、珠海等特區，隨後，有關政策框架逐步確立，但黨內外各種意見一直不絕於耳。1984年初，鄧小平視察深圳特區並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⑦根據他的意見，中央決定開放沿海十四個港口城市，推廣深圳特區經驗。黨內的不同意見表面上看一時煙消雲散。香港學者陳文鴻指出，深圳從一個小鎮，「一下子四、五年間，便一躍成為發展潛力極強的中等工業城市。假若全國其他地區能夠仿效深圳成功經驗的一二，全國工業和經濟的增長將會是極其巨大，不待世紀末便可全國總產值翻兩番了。」這是中央「在沿海城市推行深圳化的政策主要原因」^⑧。在當年的天安門國慶大遊行中，深圳特區和蛇口工業區兩輛彩車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1984年底，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視察深圳時指出，「特區的地方不大，但作用很大，影響很大，任務艱鉅，可以說是尖兵，是開拓者。」^⑨深圳特區的聲譽達到其發展史上第一個高峰。

深圳特區何以為「特區」？1980年代上半期中央和國務院長期分管對外開放和特區工作的領導人谷牧曾多次在不同場合作出解釋，簡言之，是以利用外資為主、以出口為主、以市場調節為主^⑩。但是谷牧沒有明確說明這幾個「為主」究竟是已經實現的一種狀態，抑或是特區長期的發展指針，這為不久之後爆發的大辯論埋下了伏筆。陳文鴻在1984年8月撰文，對深圳特區有沒有達到谷牧所說的以出口為主、以外資為主等問題提出質疑，進而提出了特區政策值不值得推廣到其他沿海城市的疑問^⑪。

風光無限的1984年國慶節甫一過去，深圳市委常委會議上就出現了特區主要是賺內地錢的議題。在同年12月谷牧主持召開的廣東、福建兩省工作會議上，再次出現特區賺了內地的錢、深圳拉長了基本建設戰線、特區捲入海南汽車走私案等非議。這顯然不是尋常的意見^⑫。如果不是碰上1985年的中國經濟緊縮年，這些異議還不算大問題。從1984年第四季度開始，中央經濟工作出現明顯失誤，全國消費基金增長過猛，信貸投放規模也過大。同時，利用外匯進口內銷牟利的暴富效應喧囂一時，以致1984年第四季度和1985年第一季度全國外匯儲備急降約1/3。這些問題引起國務院高度警覺。1985年的中國經濟形勢一開局就撲朔迷離，第一季度工業生產增長幅度達到23%，為改革開放以來所僅見，不過，「財政、信貸、外匯、物資不平衡給國務院主要領導人所帶來的巨大的政治、經濟壓力，大多數地方領導人並沒有同樣感覺到」^⑬。

在這一背景下，作為改革開放風向標的深圳特區面臨各方面質疑。1985年2月，香港《廣角鏡》發表了陳文鴻的〈深圳的問題在那裏？〉一文，該文直陳深圳特區沒有做到廣為宣傳的「以工業為主、以外資為主、以出口為主」，將深圳經濟問題置於眾目睽睽之下，並作出結論^⑭：

深圳的繁華，基本是依靠特區的特殊經濟政策，以進口商品和物資來賺取國內市場的錢，與原來的構想、要求背道而馳。假若深圳的實踐真的對沿海開放城市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這個參考主要是教訓，不是成功的經驗，以及深圳在未來日子能否真正地研究出解決的辦法。

深圳特區何以為「特區」？谷牧曾多次在不同場合作出解釋——以利用外資為主、以出口為主、以市場調節為主。但是他沒有明確說明這幾個「為主」究竟是已經實現的一種狀態，抑或是特區長期的發展指針，這為不久之後爆發的大辯論埋下了伏筆。

這篇文章在海內外激起強烈反響。《廣角鏡》連續幾個月開設特區問題論戰欄目，倍受矚目。應當說，這是一個善意的辯論場，觀點有對立，但沒有彼此攻擊的火藥味。辯論中不乏一些真知灼見，比如鄧樹雄指出^⑥：

「陳文」只從產值及外資等的統計數學去衡量特區成敗，忽略了社會利益及社會成本的計算，更沒有談到深圳在中國開放政策的歷史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用官方所定的「三個為主」目標（即以工業為主、以引進外資為主、產品為出口為主。），作為衡量的準繩，以一個（並非唯一的）長遠的目標去評估短期（五年內）的表現，有欠公允。尤其是這一長遠目標本身亦是一倚變數，隨特區經濟體制的演化而調整。

1984年11月，趙紫陽在深圳視察時也認為，深圳特區經濟是外向型還是內向型，一時還很難講清楚。他結合經濟工作中出現的新問題強調說，特區不要搞產品內銷的來料加工，要注重利用國內工業基礎和技術力量搞產品出口創匯，爭取外匯平衡。

論戰中屢被提及的「三個為主」問題，早在1981年中央27號文件已初步提出^⑦，但這需要長期實踐來實現或完善。1983年底至1984年間，把深圳特區建成自由港的構想引起谷牧等人的重視^⑧。谷牧於1984至1985年初在北京數次向黨政各界及全國人大介紹特區情況時指出，特區發展模式大致是以引進外資為主、以出口為主、以市場調節為主的內外結合型。這裏，他沒有明確強調以工業為主。1984年11月，趙紫陽在深圳視察時也認為，深圳特區經濟是外向型還是內向型，一時還很難講清楚。他結合經濟工作中出現的新問題強調說，特區不要搞產品內銷的來料加工，要注重利用國內工業基礎和技術力量搞產品出口創匯，爭取外匯平衡^⑨。1985年2月，谷牧在深圳特區座談會上簡化了特區發展方略，提出在三年內把深圳建成一個以工業為主、以出口創匯為主的外向型綜合性經濟特區，他還鄭重提出，「深圳特區的成敗，決不僅僅是深圳本身的問題，而是影響到港澳收回的問題，影響到香港收回後基本制度不變、繼續保持繁榮的問題。」^⑩成敗之論在這之前是不可想像的。由於經濟局勢不明朗，這次會議設定目標較多，主次難分，在工作部署上難以痛下決心。

1985年3月，主管全國財經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在六屆人大三次會議期間對港澳記者談到特區賺了內地的錢、特區外向型程度較低、特區耗費了大量外匯等缺陷^⑪。一個月後，他到深圳視察時認為，特區的基建規模要壓縮，生產發展速度也要降低，以便度過難關。他還說，「特區的經濟發展光靠國家長期『輸血』來維持是不可能的，現在看來，要果斷地拔掉『針頭』。」^⑫這番談話傳至香港，輿論譁然。

國務院於1985年先後召開四次全國省長會議，採取了外匯管制、控制信貸、壓縮基建等舉措，整頓經濟工作。深圳特區主要是依靠銀行貸款搞基建，其比例在1984年就上升到了44%^⑬。深圳運用銀行信貸返本還利籌集基建資金的做法，在1984年被中央肯定為成功經驗並推廣到內地。可是，當全國從1985年4月起「一刀切」緊縮銀根後，特區如火如荼的基建工作就立刻面臨很大困難。此外，一旦外貿權限上收，特區進出口商業這一暴利行業也迅速由盛即衰。

應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梁湘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國光於1985年3、4月間帶隊到深圳調研。劉國光提出，深圳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應該是外向型的，以先進工業為主，工貿並舉，工貿技結合的綜合性的經濟特區。他還對特區實現戰略目標的階段性提出了具體設想^⑭。6月，在深圳市委、市政府舉行

的一次座談會上，與會的國內經濟理論界名流對劉國光等撰寫的〈深圳經濟特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問題研究報告〉給予了肯定²⁴。

二 辯論高潮與中央新決策

1985年6月5日，鄧小平約谷牧談話，聽取關於特區工作的匯報。6月29日，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黨代表團在北京拜會鄧小平時說，他們在深圳訪問時看到了一片朝氣蓬勃、全面發展的興旺景象。鄧小平說：「深圳經濟特區是一個試驗，路是否走對，還要看一看。總之，它是社會主義的新事物。搞成功是我們的願望，不成功是一個經驗嘛。」²⁵7月15日，鄧小平會見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總理錢伯斯(George M. Chambers)一行人。錢伯斯談到他離開北京後還要到深圳參觀，鄧小平說：「深圳經濟特區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試驗。現在看來，我們原來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你們可以看到深圳的發展是很快的，但這畢竟是一個試驗。現在還有一些問題沒有解決。不過，特區開始才三年多一些時間，再過三年總會找出辦法解決這些問題的。」²⁶

鄧小平這兩次談話在海外激起很大反響。海外媒體刊登了一系列關於深圳特區的文章，懷疑和挫折感充斥其間，比如，1985年7月9日，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刊登〈深圳經濟特區的挫折反映了中國現代化的苦惱〉；7月29日，美國《美洲華僑時報》刊登〈深圳試驗得失的評估〉；8月1日，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刊登〈中國深圳：放任自流的貿易和社會弊病〉。香港《信報》還針對深圳特區發表「十二評」²⁷，不乏譏嘲之辭。1985年7至8月間，各種非議達到最高潮。

深圳領導人於1985年7月先後三次邀請香港人士座談，為特區政策辯護。梁湘還在《深圳特區報》的訪談中，反駁「輸血論」、「特區賺了內地的錢」等非議，並坦承要把特區建設成為以工業為主的外向型的綜合性經濟特區，還要走很長的路²⁸。同月，國務院決定優先支持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中基礎較好的上海、天津、大連、廣州四個城市，其他城市則放慢同外國簽署合同的步伐²⁹。7月下旬，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率團訪問深圳特區並讚揚深圳市容前後變化很大³⁰。8月初，鄧小平在北戴河接見竹入義勝所率訪華團時試圖對自己先前的言論進行一定的澄清³¹：

我們特區的經濟從內向轉到外向，現在還是剛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的產品還不多。只要深圳沒有做到這一步，它的關就還沒有過，還不能證明它的發展是很健康的。不過，聽說這方面有了一點進步。

前不久我對一位外國客人說，深圳是個試驗，外面就有人議論，說甚麼中國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變，是不是我否定了原來關於經濟特區的判斷。所以，現在我要肯定兩句話：第一句話是，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第二句話是，經濟特區還是一個試驗。這兩句話不矛盾。我們的整個開放政策也是一個試驗，從世界的角度來講，也是一個大試驗。總之，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是堅定不移的，但在開放過程中要小心謹慎。

深圳領導人於1985年7月先後三次邀請香港人士座談，為特區政策辯護。梁湘還在《深圳特區報》的訪談中，反駁「輸血論」、「特區賺了內地的錢」等非議，並坦承要把特區建設成為以工業為主的外向型的綜合性經濟特區，還要走很長的路。

同年8月中旬，台灣首次舉辦以大陸改革為主題的大型研討會。有與會者認為，「中共的經濟改革尚在試驗階段，不是沒有問題，但恐怕也會慢慢進步。不能以為他們一定搞不好而自我陶醉，否則將是致命的錯誤。」^⑳

鄧小平的8月談話為深圳特區盡快轉向以出口和工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下了最後決心。9月，全國黨代會通過的關於制訂「七五」計劃的建議指出，「經濟特區要在繼續積極引進先進技術的同時，逐步做到生產以外銷為主，力爭給國家多創外匯。」^㉑

全國黨代會之後，由於中央和廣東省進一步壓縮信貸、控制外匯和實施進出口許可證等，給深圳經濟活動帶來巨大影響。商業極不景氣，反映在旅館業上，平均住房率只有20%，甚至更低；最景氣的賓館住房率也只有40%至50%。工業生產也受牽連，出現廠房租不出去、賣不出去的現象^㉒。到1985年底，有關部門下達「特區不例外」的文件已有四十一個，特區很多特殊政策權限被縮小甚至取消^㉓。谷牧在1988年退居二線之前的一次談話中回憶說，「特區不得例外」是當時「實在有困難，混不過去才這樣寫的」^㉔。

在上述背景下，深圳經濟調整的重中之重是基建。1985年初的深圳基建工作會議確定年度目標是完成投資25億元，比1984年的16億元增長近60%。但是到了6月和9月，國務院先後召開年度第三次和第四次全國省長會議，研究如何壓縮基建。在6月會議上，趙紫陽與梁湘商定了基建指標，即1985年要保持1984年的量。雖然梁湘在部署1985年下半年工作時，已經表示要壓縮基建規模^㉕，但實際上，從他一系列講話和行動來看，應該是認為搞基建與發展外向型經濟可以並行不悖。1985年下半年，國務院特區辦公室顧問張根生等人到深圳調研後，寫了一份報告送呈趙紫陽，趙紫陽批示：告谷牧同志，這個報告我粗看了一遍，後面的意見我是同意的。所謂「後面的意見」，就包括深圳基建規模太大了，要壓縮控制^㉖。梁湘應該沒有獲悉這一動向，在1986年初全國經濟特區工作會議前夕，他就把1986年度基建預計量進一步提高到近40億元^㉗。1985年12月，梁湘在北京向中共中央直屬機關近八千名司局級以上幹部匯報特區工作時，講了五點不足之處，唯獨沒有講基建。如果聯想到即將召開的特區工作會議以及谷牧對深圳基建工作的嚴厲批評來看，梁湘這時與上級的確是缺乏有效溝通。毫不奇怪，1985年8月和1986年5月，梁湘相繼被免去市長和市委書記職務，帶着「攤子鋪得過大」、「沒有真正做到三個為主」、「好大喜功」等指責^㉘，心情抑鬱地退居二線^㉙。

在身陷經濟困局之際，深圳特區留下了不少遺憾。比如，醞釀有年的在深圳創辦中國實驗大學一事，本已得到鄧小平同意，並被鄧視為深圳可以辦的兩件事情之一（另一件事是興建核電站）。該大學由梁湘和國民黨元老陳濟棠之子陳樹柏籌劃，然因1985年經濟形勢大變而夭折，陳樹柏生前引為憾事^㉚。此外，在1985年的論戰中，深圳特區貨幣發行問題也是一個熱點話題。發行特區貨幣最早於1981年提出來，1984年鄧小平、陳雲都表示支持。1985年經濟形勢大變，發行工作暫告中止。特區貨幣發行與否，始終與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外資引進的實際影響有內在關係。隨着人民幣匯率持續調整，引進外資和出口貿易不再受到大的影響，特區貨幣發行與否後來已經沒有考慮的必要^㉛。

1980年代的深圳特區還有一個特殊的政治現象，即對外是一個整體，內部則分為深圳和蛇口工業區兩塊。蛇口名義上隸屬於深圳特區，是深圳市一個行

1985年12月，梁湘在北京向中共中央直屬機關近八千名司局級以上幹部匯報特區工作時，講了五點不足之處，唯獨沒有講基建。如果聯想到即將召開的特區工作會議以及谷牧對深圳基建工作的嚴厲批評來看，梁湘這時與上級的確是缺乏有效溝通。

政區，但實際上相對獨立，擁有一些市級權限。1984年，經中央同意，這一行政框架得以確定。袁庚領導的蛇口工業區銳意進取，不讓深圳分毫；兩雄競秀，兩者的紛爭不斷上報廣東省和中央。在1985年針對特區的各種非議潮中，蛇口工業區可謂白璧之身，不僅一直堅持做到「三個為主」，而且引進工作確立了「五不引進」原則（即產品爭出口配額的不引進、來料加工的不引進、補償貿易的不引進、技術落後的不引進、污染嚴重而無法解決的不引進）。同年9月，蛇口工業區的經驗被廣東省委總結為「蛇口模式」並在珠海和汕頭特區加以推廣^④。在深圳特區飽受非議之際，這種對比極其鮮明。

三 國內經濟政策再度調整下的特區新局面

1986年春節之前，谷牧在深圳主持召開全國經濟特區工作會議，主要討論了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問題。會議強調指出，「特區領導的指導思想和工作重點要從前幾年鋪攤子、打基礎轉到抓生產、上水平、求效益方面來」^⑤。參加會議的有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特區，廣東、福建兩省和國務院二十九個部門的負責人。深圳特區在引進外資遇到困難之際，更多地期望依靠國內支持，建立和發展特區外向型工業體系。谷牧在會上坦承自己在1985年初對壓縮基建沒有多講。這並非失誤，因為當時的環境還沒到這一步。谷牧批評深圳領導人，「在過去一年中，沒有把主要精力用在改革，加強管理，改善企業和職工的素質和提高經濟效益這些方面，沒有奮力『爬坡』、『上樓』，仍然在鋪攤子、擴大基建規模。」^⑥會後，深圳以「壯士斷臂」（袁庚語）的決心來解決壓基建問題：基建項目砍掉1/3，停建、緩建804個項目，十八層以上高樓停建51幢，共壓縮基建投資25.7億元^⑦。由此，深圳經濟蕭條，國內外一時出現不少「特區試驗失敗了」的言論。當時，有如下三個議題引發熱議：

第一，關於辦特區的黃金時代有沒有過去的問題。由於國際上出口加工區處境日益困難，國外一些人對中國特區前景持懷疑態度。谷牧對此持否定看法，認為「我們辦特區的方針、政策和任務同他們不一樣。我們有遼闊的後方作依託，有十億人口的國內市場可周旋，我們的特區要起『窗口』和『樞紐』的作用，這一些統統是外國的經濟特區所沒有的。因此，不能說世界上特區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的特區就辦不好了」^⑧。袁庚對谷牧的看法表示贊同。1986年5月，袁庚在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亞洲研究中心發表演講時豪氣干雲地指出^⑨：

中國改革正走向宏觀控制的市場協調模式。而進入這種模式就會不可避免地借鑒資本主義的若干方法。從這個角度來說，植入一些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方式的經濟特區，便可繼續進行有益的試驗，直至摸索出一套有中國特色的行之有效的經濟模式來。有人說，隨着十四個沿海城市的開放和內地全方位地邁開改革與開放的步伐，特區的試驗性作用已經下降或消失，我不完全同意這種觀點。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只是剛剛起步，它所涉及問題極為廣泛和複雜，我甚至覺得，在「七五」期間，蛇口作為試管的作用不但不

在1985年針對特區的各種非議潮中，蛇口工業區不僅一直堅持做到「三個為主」，而且確立了「五不引進」原則。蛇口工業區的經驗被廣東省委總結為「蛇口模式」並在珠海和汕頭特區加以推廣。在深圳特區飽受非議之際，這種對比極其鮮明。

會減弱，反而範圍會更廣、程度會更深，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試驗更具有挑戰性。……東方則完全有可能通過發揮自己的優勢，憑藉以先進科技改造過的傳統常規工業為舞台，上演一齣「後來居上」的威武雄壯的活劇來。……從世界全局和長遠來觀察問題，我對經濟特區未來的發展，對我國經濟的騰飛充滿信心。

第二，關於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問題。對此，1985年劉國光提出三個認定標準：資金來源以外資為主，外資在整個工業投資中達到50%以上；產品以外銷為主，出口的特區產品應當逐步達到佔特區企業生產的商品產值的70%以上；進出口貿易的外匯收支要平衡有餘^⑤。有人指出，「如果單以產品能外銷、外匯平衡作為外向型經濟的唯一標誌，那末，特區搞『三來一補』，外向型是容易達到的。……但這只是一種低級外向型經濟模式，……不能真正發揮特區的『四個窗口』和『兩個扇面』輻射的樞紐作用。」^⑥1986年的特區工作會議重申1983年中央關於提升特區產業層次的精神，提出特區產業結構以具有先進技術水平的工業為主^⑦。

1986年的特區工作會議提出特區產業結構以具有先進技術水平的工業為主。然而，西方國家一直限制高科技輸往中國，日本更視中國為競爭對手，在深圳投資的以港商為多，投資項目以勞動密集型為主。指望通過外資來獲取先進技術，難免一廂情願。

然而，西方國家一直限制高科技輸往中國，日本更視中國為競爭對手，在深圳投資的以港商為多，投資項目以勞動密集型為主。指望通過外資來獲取先進技術，難免一廂情願。特區工業發展只能退而求其次。1986年下半年，日元、台幣相繼升值，港幣相對貶值，大量訂單湧進香港，為深圳工業振興提供良機。「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曾經因為引進的技術水平偏低而受到非議，但「在艱難的經濟形勢下，深圳很快意識到，採取何種對外經濟合作形式，不是一個抽象的理論問題，不能進行簡單類比，而要根據自己經濟的發展水平和需要，於是採取了鼓勵『三來一補』發展的政策」，使1986年此項創匯比1985年增長89.4%，1987年又有進一步發展，發揮了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⑧。1987年經濟特區工作會議紀要指出，「深圳出口額七億二千五百萬美元，基本上做到外匯收支平衡有餘；自產工業品出口比重已佔工業產值的45% (包括來料加工則佔51%)」^⑨。據此，鄧小平很快做出深圳已經基本實現外向型經濟目標的判斷^⑩。

第三，關於特區新階段的看法。1986年初特區工作會議普遍被視為1980年代深圳特區史的階段性分界。筆者認為，考慮「新階段」，必須重視「一大一小」兩個條件：小條件是深圳特區自身指導思想轉向，大條件是中國宏觀經濟決策變化，大條件決定小條件的實現程度。

「七五」計劃開局頭一年的1986年第一季度，經濟緊縮下的全國工業增長速度為4.4%，「從中央到地方，從經濟管理部門到經濟理論界，許多人紛紛驚呼經濟『滑坡』，要求放鬆銀根，給企業『輸血』。在強大的壓力下，實行經濟緊縮的決心動搖了。」^⑪1986年第二季度開始，國務院決定放鬆銀根，刺激經濟增長。同年6月，經濟學家薛暮橋寫信給趙紫陽，希望中央不要放棄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薛暮橋回憶：「此信不合趙紫陽的意圖，此後他不再徵求我的意見。」^⑫鄧小平8月視察天津時說：「對外開放還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問題。」^⑬薛暮橋在回憶錄還提到，1988年12月初，趙紫陽曾找他、劉國光和吳敬璉談話，表示接受批評意見，說最近一年犯了通貨膨脹的失誤。薛暮橋則表示不是

一年，至少已有三年^⑤。鄧小平的看法不同。他後來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明確肯定了1984至1988年的經濟加速發展，「與『大躍進』不同，沒有傷害整個發展的機體、機制」。鄧小平還批評了不敢放開手腳、過份看重經濟穩定、協調發展的思想^⑥。這是鄧小平在蘇東劇變之後的政治評價。以歷史過程而言，1988年價格關關失敗後，中國改革走了一段彎路，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以此觀之，這裏面的確有發展模式優先次序上的意見分歧，令人深思。

中國在發展十字路口的大抉擇，與深圳特區息息相關。深圳特區因宏觀經濟決策調整而受益是確鑿無疑的。隨着國務院放鬆銀根，大力倡導橫向經濟聯合、追加深圳特區基建指標、照顧特區出口配額和實施許可證制度、國際經濟形勢好轉等因素疊加，對深圳特區經濟復蘇極為有利。1986年5月，深圳市政府進一步減免特區企業稅費。針對外商投資熱情持續冷卻的動向，國務院於同年10月出台〈關於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國發〔1986〕95號）。隨後，深圳市政府給予外商在利潤所得稅、產品進出口稅、土地使用費等方面更優惠政策，各項經濟指標迅速回升。谷牧指出，特區要創造引進外資的「小氣候」，為全國「大氣候」摸索道路，「要恢復我們的形象，改變外國人的看法，創造成功的經驗。」^⑦

1986年12月，新任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李灝指出，「特區前6年的建設，應該算是個初創奠基階段，也就是第一個階段。這個階段的任務應該說是基本完成了。從現在起，特區進入了一個發展新階段。」^⑧谷牧贊同這一看法。1987年2月召開的特區工作會議對1986年特區工作會議成果進行了鞏固，強調繼續壓基建、抓生產、上水平、求效益，「使外向型經濟發展得更快些更好些」^⑨。6月，《廣角鏡》刊登專文指出，「深圳特區，現在已經渡過了它的困難時期！深圳大規模的新發展，正在引起外界的注意。」^⑩這與兩年前這份雜誌率先向深圳「發難」以致引發關於中國經濟特區成敗的大論戰情境，已迥然不同。

中國在發展十字路口的大抉擇，與深圳特區息息相關。深圳特區因宏觀經濟決策調整而受益是確鑿無疑的。隨着國務院放鬆銀根，大力倡導橫向經濟聯合、追加深圳特區基建指標、照顧特區出口配額和實施許可證制度、國際經濟形勢好轉等因素疊加，對深圳特區經濟復蘇極為有利。

四 辯論之外的深圳政治體制改革

自鄧小平1985年提出深圳是一個「試驗」之後，從谷牧到廣東省委、深圳市委的理解是，特區「試驗」不止於經濟體制改革。1986年初的經濟特區工作會議紀要指出，「到會同志反覆領會小平同志關於『辦特區是個試驗』的指示精神，……務使這項前人未曾做過的重要試驗獲得成功。」^⑪鄧小平於1986年夏重提政治體制改革後，谷牧對「試驗」有新的理解，指出「確保這項改革、開放的社會試驗〔興辦特區〕取得更大的成功」^⑫。在1987年初的特區工作會議上，谷牧又一次強調：「小平同志指出，辦特區是一項試驗。我們現在可以說，這項探索性的改革開放的社會試驗正在逐步取得成功。」^⑬但鄧小平於同年6月對南斯拉夫外賓的一席談話表明他所說的「試驗」主要仍是指經濟方面^⑭。

在胡耀邦等中央領導人支持下，蛇口工業區積極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嘗試，倍受矚目。從1983年開始，蛇口工業區每兩年差額民主選舉一屆管委會，每年進行一次信任投票。參加投票的幹部群眾由1983年的300多人發展到1986年的2,000多人，1986年投票率達84%。此外，蛇口工業區還提倡在憲法範圍內的言

谷牧在1982至1984年間多次倡議要賦予梁湘「總督權」，初衷是深圳特區在沒有具體立法的情況下，事權要集中。在谷牧促動下，深圳特區擬定了實施方案並進行初步嘗試。惟因遭遇1985年的經濟困境，特區事權被壓縮，此事不再被提及。

論自由、民主，規定不審查報紙稿件。1985年2月，《蛇口通訊》發表了署名甄明侃的〈該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進一言〉公開信，指名道姓批評領導，在全國激起強烈反響。蛇口工業區還有二十餘個群眾團體，這些團體可自由表達見解，對決策者形成壓力，被稱為「壓力團體」^⑩。《南方日報》刊文肯定了蛇口各種民主舉措，認為「黨風好，帶動了社會風氣的改變。……基本上抵制了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侵蝕」^⑪。

深圳特區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也進行了探索。谷牧在1982至1984年間多次倡議要賦予梁湘「總督權」，初衷是深圳特區在沒有具體立法的情況下，事權要集中^⑫。1984年鄧小平視察深圳後，形勢空前有利。在谷牧促動下，深圳特區擬定了實施方案並進行初步嘗試。惟因遭遇1985年的經濟困境，特區事權被壓縮，此事不再被提及。

與此相應的是，有關深圳人大和政協機構的設置多次有反覆情形。1985年3月，深圳市委向廣東省委報告，擬成立政協機構。任仲夷主政的廣東省委覆函指出，「省委意見，根據『新事新辦、特事特辦』和特區的機構要高度精簡的精神，此事暫不考慮。」^⑬這一年下半年，在深圳特區困難之際，繼任仲夷之後，林若主政的廣東省委將深圳設立人大和政協機構問題上報中央，中央組織部批覆，由廣東省委根據憲法和有關文件精神自行決定。於是，廣東省委同意在深圳設立人大和政協機構^⑭，並於1986年8月致函深圳市委，「迅速設立深圳市人大籌備工作領導小組，力求今年內依法召開市人大會議。」^⑮1986年夏，鄧小平幾次談到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隨後，趙紫陽指出，「政治體制改革你們深圳可以先行一步」^⑯。趙紫陽、谷牧等人認為特區政策是中央直接掌握，立法機關的設立暫緩為宜，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沖等人支持。這也符合鄧小平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看法。比如，1987年6月12日，他在會見南斯拉夫外賓談到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時說，「我們決定建立經濟特區就可以立即執行，沒有那麼多互相牽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又說，「調動積極性是最大的民主。至於各種民主形式怎麼搞法，要看實際情況。」^⑰深圳市委後來提出，不搞人大，但要加強決策民主化，得到中央贊同。治理整頓期間，形勢又有變化。到1990年底，深圳還是正式設立了政協和人大機構。

《深圳青年報》1986年10月21日刊發〈我贊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轟動一時^⑱。1987年1月中旬，新華社播發李灝講話，強調特區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⑲。廣東省委、深圳市委認為《深圳青年報》刊登的一些文章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嚴重^⑳。隨後該報連同出現若干「問題」的《特區工人報》和《特區文學》一起停刊^㉑。同年2月，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勛視察深圳，已六年沒回廣東、八年沒到深圳的他一路上讚賞不斷，「看了很受鼓舞，使人眼花繚亂，概括一句話，出乎意料的好。」^㉒習仲勛代表中央肯定了省市及時平息資產階級自由化事件的做法。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曾於1964至1978年期間在廣東省擔任領導的王首道，於1987年2月在視察深圳時指出，開放不能等同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深圳特區的成功是改革開放的結果^㉓。袁庚也批駁了認為開放是導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主要原因的觀點^㉔。

五 大辯論及抉擇的意義

鄧小平一直關注着深圳。1987年5月至6月間，他在兩次談話中高度評價了深圳的成就：

金〔日成〕主席去過深圳沒有？下次有機會可以去旅行。最近深圳技術比較高的產品可以打入國際市場。開放政策的成功就要看這一條，這是真正的成功。深圳只用六七年時間，從一個小城鎮變為一個現代化城市，經驗是很寶貴的④。

我去過一次深圳，那裏確實是一派興旺氣象。……當時我們黨內還有人採取懷疑的態度，香港輿論界不管是反對我們的還是贊成我們的，也都有人持懷疑態度，不相信我們是正確的。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當然一個完全新的事物不允許犯錯誤是不行的，有一點錯誤也是很小的。他們自己總結經驗，由內向型轉為外向型，就是說能夠變成工業基地，並能夠打進國際市場。這一點明確以後，也不過兩三年的時間，就改變了面貌。深圳的同志告訴我，那裏的工業產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匯收支可以平衡。現在我可以放膽地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決定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懷疑都可以消除了⑤。

陳雲也很關心特區工作，一度有意到深圳看一看，但因諸種原因而沒有成行⑥。1986年底和1987年2月，陳雲夫人于若木兩次到深圳訪問。于若木說，「我沒有想到深圳這麼大，這麼漂亮。……深圳的發展速度很快，對全國很有吸引力。對外是引進先進技術的窗口，做了大量的工作；對內是轉移先進技術的樞紐，發揮了不小的作用。雖然社會上對深圳的看法有些不同，但成績是主要的。深圳的工作經過調整後，正在健康地發展。」⑦

如何評價1984年秋至1987年初這一期間的深圳工作，深圳政學界一直意見分歧⑧。筆者認為，總結這一時期的深圳工作，一則繞不開全國改革開放「大氣候」不斷變化的背景，應跳出深圳看深圳；二則應看到社會實踐的連續性，如《世界經濟導報》1987年刊發的一篇文章評論指出，「我們也不能不看到，深圳的建設早在經濟緊縮之前已經打下相當堅實的基礎，使深圳經濟大發展的條件已大體完備。緊縮以及隨之而來的調整，只是促進深圳的外向型經濟迅速成型，把深圳推進了以追求『成熟』為標誌的新的發展階段。」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1988年初在視察深圳時指出，「我們〔對〕1980年到1985年的工作是肯定的，1986年到1987年，在那個基礎上更上一層樓。要把這兩段統一起來，我們甚麼事情都要有個連續性。……我說深圳的同志現在在這個問題上，估價過去的工作如果還有不同角度的話，就用剛才我講的話統一起來。」⑩這個說法有說服力。

關於特區一度提出以幾個「為主」的指導思想，之後還有一些爭論餘緒。比如1988年1月，《人民日報》的《情況彙編》連續發了三期關於深圳特區的報導，認為「1986年初，深圳市委、市政府以『壓基建、抓生產、上水平、求效益』取代了建特區之初的『四個為主』，「使特區經濟工作的『特』字蕩然無存」。深圳領導人

1984年秋至1987年初這一期間的深圳工作，一則繞不開全國改革開放「大氣候」不斷變化的背景，應跳出深圳看深圳；二則應看到社會實踐的連續性，深圳的建設早在經濟緊縮之前已經打下相當堅實的基礎。

縱觀1980年代中期關於經濟特區成敗的大辯論及其抉擇，在深圳建市三十餘年以來從未有過如此充分的

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認為這是不負責任的報導^⑩。1988年出版、名噪一時的《山坳上的中國——問題、困境、痛苦的選擇》一書，也有專章認為深圳工作偏離了「三個為主」的正確方向^⑪。這一類責問，與1985年的爭論一脈相承。筆者認為，1986年特區工作會議之後的深圳，初期不得已執行了以工業為主，以出口為主的發展思路。1987年經濟形勢好轉後，以外資為主這一面有了顯著加強，以市場調節為主這一面也重新得到重視。發展的難題逐漸轉移到如何實現外向型經濟的高標準上面。幾個「為主」的討論，在發揮其應有的歷史作用後，已然謝幕了。

縱觀1980年代中期關於經濟特區成敗的大辯論及其抉擇，在深圳建市三十餘年以來從未有過如此充分的

深圳在經歷近兩年的經濟調整之後迅速恢復活力，城市經濟實力發展迅猛，對國家貢獻增大。趙紫陽在李灝1985年到深圳赴任前夕曾表示，深圳經濟總量很小，不在意能給國家創多少外匯和財政收入，但到1986年底就改變了看法^⑫。1987年3月的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特區建設「有顯著進展」^⑬。1987年深圳出口創匯躍居全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前十名之列。從這一年開始，中央大幅度調高深圳上繳財政收入和外匯收入的指標^⑭。

深圳對中央推進改革開放的決策也有所貢獻。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深圳是國內最好的試驗場。報告還提出，要充分發揮特區「在對外開放中的基地和窗口作用」^⑮。在中央推行的國際大循環戰略構想中，深圳是當仁不讓的排頭兵。1988年6月鄧小平說要在內地造幾個「香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謂「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只要是講效益，講質量，搞外向型經濟，就沒有甚麼可以擔心的」^⑯，其信心主要源於他參與籌劃特區發展的經驗，1985至1987年這一時期是濃重的一筆。

深圳特區順利走出調整期並有新發展，為履行中央賦予的保障香港繁榮穩定的政治使命提供了前提。如1980年代後期美國學者傅高義 (Ezra F. Vogel) 所指出，深圳在國家意義上的重要性可能在於可以為收復香港提供一個緩衝地帶，「一方面向中國人民傳播世界資本主義的經驗，另一方面教育香港人如何在中國的共產主義制度下運作。」^⑰

就新時期中央與地方關係而言，深圳是一個典範。建國初期，中央在廣東曾推行「反地方主義」，對中央與地方關係造成負面影響。改革開放以來，胡耀邦、趙紫陽、谷牧等中央領導人反覆強調，深圳和蛇口要為全國體制改革摸索經驗而不單純是把本地經濟總量做大。1986年特區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了「特區是全國的特區，全國支持特區，特區服務全國」^⑱。深圳度過1986年的經濟調整難關，也有全國襄助之功。

在對外開放思想啟蒙方面，深圳尤其是蛇口的實踐，對內地的震動和影響難以用有形價值來衡量。1980年代經濟特區廣開言路、民主決策、營造朝氣蓬勃的發展環境的做法，值得人們繼承和發揚。

註釋

- ① 1980年代初，黨內關於創辦經濟特區曾有不同意見，爭論高潮發生在1982年2月召開的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上。這次會上，對中國經濟政策有很大話語權的陳雲曾就〈舊中國租界的由來〉材料專門批示：「此件發全國各省市。對於辦經濟特區，要警惕這類問題。」陳雲沒有簡單否定辦經濟特區，但頗有顧慮。鄧小平對這次會議的基調並不滿意，刻意保持了沉默。參見王碩：〈胡喬木眼裏的深圳特區〉，《廣東黨史》，2009年第6期，頁36-38；楊繼繩：《鄧小平時代》（香港：三聯書店，1999），頁245；關山：〈任仲夷：南粵開風氣 多虧鄧小平〉，《南風窗》，2004年7月16日，頁18。
- ② 比如，引用《廣角鏡》1985年2月16日第149期陳文鴻〈深圳的問題在那裏？〉一文出現的問題。董濱、高小林：《突破：中國特區啟示錄》一書誤把這篇文章寫成發表於《廣角鏡》1985年5月16日第152期（參見董濱、高小林：《突破：中國特區啟示錄》〔武漢：武漢出版社，2000〕，頁229）。此後，眾多著述紛紛摘抄，一錯再錯，一些有條件的著者也沒有去圖書館對這篇文章進行查驗。
- ③ 倪振良：《深圳傳奇》（深圳：海天出版社，1994），頁230。
- ④⑦ 深圳市史志辦公室編：《中國經濟特區的建立與發展（深圳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頁187、194；160。
- ⑤ 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寫作組編：《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謎》（深圳：海天出版社，1991），頁108。
- ⑥ 有代表性的，如《深圳傳奇》、《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謎》、《中國經濟特區的建立與發展（深圳卷）》相關章節，其主要理論根據是，1987年3月，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李灝在市委工作會議上指出，「前幾年的改革，有一個經驗教訓很值得我們重視，這就是放權給企業，搞活微觀經濟之後，特區經濟確實以較高的速度發展，但同時宏觀方面又程度不同地出現失控現象，比如，基建規模過大，結構不盡合理，消費基金增長過猛，外匯消耗過多，人員過於膨脹等，迫使前年和去年特區經濟不得不作較大的調整。」參見李灝：《李灝深圳工作文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112。
- ⑧⑩ 陳文鴻：〈深圳建設資金來源的一個初步考察〉，載陳文鴻、曾樹基：《深圳剖析》（香港：Cerd Consultants, 1985），頁13；21、22。
- ⑨⑫ 〈趙紫陽同志視察廣東時的談話〉（1984年11月21日），載中共廣東省委辦公廳編：《中央對廣東工作指示彙編（1983年—1985年）》（內部資料，1986），頁206；207-208。
- ⑩ 參見〈谷牧向老幹部介紹對外開放政策和特區建設方針〉，《深圳特區報》，1984年4月23日，第1版；〈谷牧縱論中國對外開放形勢〉，載香港《中國經濟特區年鑒》編輯部編：《中國經濟特區年鑒：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及各省市對外開放經濟資料彙編（1984開放號）》（香港：香港中國經濟特區年鑒出版社，1985），頁107、108。
- ⑫ 〈谷牧同志在廣東、福建兩省會議上的講話〉（1984年12月7日），載《中央對廣東工作指示彙編（1983年—1985年）》，頁238、240。
- ⑬⑭ 陳子明：《陳子明反思十年改革》（香港：當代月刊出版社，1992），頁128；129。
- ⑭ 陳文鴻：〈深圳的問題在那裏〉，《廣角鏡》，1985年2月16日，頁54-55。
- ⑮ 鄧樹雄：〈談深圳特區的評價與問題〉，《廣角鏡》，1985年5月16日，頁64。
- ⑯ 〈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福建兩省和經濟特區工作會議紀要」的通知〉（1981年7月19日），載中共廣東省委辦公廳編：《中央對廣東工作指示彙編（1979年—1982年）》（內部資料，1986），頁173-75。
- ⑰ 這一構想的理論形成，最早應該追溯到198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蔣一葦。1983年8月，蔣一葦完成〈過渡地區論——試論香港的未來地位與深圳特區的發展戰略〉一文並上報中央領導人谷牧、趙紫陽等參閱。文章提出一些重要思考，其中包括建議中央興辦經濟特區時，效仿香港，把深圳特區建成綜合性的自由貿易區。蔣一葦的構想給谷牧以啟發。1984年4月上旬，在北京召開的中國改革開放史上有里程碑意義的沿海部分城市對外開放座談會上，谷牧認為，如果特區貨幣問題一旦解決，經濟特區二線關也早日試行管理，深圳特區就立刻變成自由港了。參見蔣一葦：〈過渡地區論——試論香港的未來地位與深圳特區的發展戰略〉（1983年8月26日），深圳市檔案館，A1-1983-5；〈常委會議記錄〉（1984年4月11日），深圳市檔案館，A1-1984-1。
- ⑱ 〈谷牧同志在深圳經濟特區工作座談會結束時的講話〉（1985年2月26日），載《中央對廣東工作指示彙編（1983年—1985年）》，頁362。

- ⑳ 參見曾澍基：〈中國經濟發展與特區貨幣問題〉，載陳文鴻、曾澍基：《深圳剖析》，頁86。
- ㉑④④ 董濱、高小林：《突破》，頁238；406。
- ㉒③⑧④④④④ 參見〈谷牧同志在經濟特區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86年1月5日），載《谷牧同志關於特區工作的談話要集》，頁149；146；145；157；158。
- ㉓ 黃年：〈劉國光縱論深圳特區發展戰略〉，《深圳特區報》，1985年4月24日，第1版。
- ㉔ 李幹明：〈京津滬穗和本市專家學者聚集一堂〉，《深圳特區報》，1985年6月9日，第1版。
- ㉕ 〈鄧小平會見阿爾及利亞外賓時指出 深圳是個試驗〉，《深圳特區報》，1985年6月30日，第1版。
- ㉖ 〈中國的開放和改革一定會成功〉，《深圳特區報》，1985年7月16日，第1版。
- ㉗ 參見俞可平、倪元輅主編：《海外學者論中國經濟特區》（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頁247-51。另參見香港《信報》署名鄧凡的一系列評論文章：〈鄧小平的講話震動深圳〉（1985年7月12日）、〈建築在假大空的基礎上〉（1985年7月13日）、〈深圳大學是深圳特區的縮影〉（1985年7月14日）、〈有關特區「輸血」的爭論〉（1985年7月16日）、〈輸血論醞釀已久 服務業獨木難支〉（1985年7月17日）、〈百病纏身的深圳特區〉（1985年7月18日）、〈由上到下大發「改革」財〉（1985年7月19日）、〈外商洽談多而投資少〉（1985年7月20日）、〈對深圳建設的平議〉（1985年7月30日）、〈從縮而不收的經濟特區說起〉（1985年7月31日）等；同時參見袁庚對《信報》評論文章的意見，〈在特區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85年12月25日），載招商局集團辦公廳、招商局史研究會編：《袁庚文集》（內部資料，2012），頁164。
- ㉘ 〈梁湘就目前對深圳的種種議論答本報記者問〉，《深圳特區報》，1985年8月2日，第1版。
- ㉙ 〈谷牧會見日本朋友時說 中國對外開放政策沒有改變〉，《深圳特區報》，1985年7月16日，第1版。
- ㉚ 〈梁湘會見日公明黨代表團 竹入義勝讚深圳變化很大〉，《深圳特區報》，1985年7月26日，第1版。
- ㉛ 鄧小平：〈特區經濟要從內向轉到外向〉，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133。
- ㉜ 〈台灣首次舉辦以大陸改革為主題大型研討會〉，《世界經濟導報》，1985年9月9日，第3版。
- ㉝ 〈中共中央關於制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深圳特區報》，1985年9月26日，第1版。
- ㉞⑤⑤⑤ 陳樂波：〈深圳是怎麼走出困境的〉，《世界經濟導報》，1987年11月16日，第5版。
- ㉟ 古念良：〈正視困難 繼續前進〉，載周維平、許隆主編：《中國經濟特區發展新階段》（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86），頁52。
- ㊱ 〈谷牧同志在聽取深圳市領導同志匯報工作時的談話要點〉（1988年3月16日），載深圳檔案館編：《谷牧同志關於特區工作的談話要集》（內部資料，1995），頁181。
- ㊲ 〈深圳繼續保持良好發展勢頭〉，《深圳特區報》，1985年7月31日，第1版。
- ㊳⑥⑥ 谷牧：〈在經濟特區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87年2月10日），載中共廣東省委辦公廳編：《中央對廣東工作指示彙編（1986年—1987年）》，上冊（內部資料，1988），頁246；257。
- ㊴ 聞聲：《梁湘傳奇》（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頁175。
- ㊵ 王碩：〈中國實驗大學在深圳的籌建〉，《百年潮》，2012年第1期，頁22-26。陳樹柏先生於2013年春節期間病逝，生前熱望未來得及實現。在他病逝前夕，筆者與袁傳寬先生（數學家華羅庚弟子、陳樹柏好友）已有聯絡，並爭取到深圳市政府領導人的重視，於2013年5月，促成陳樹柏先生在美國矽谷創辦的國際科技大學與深圳南方科技大學兩校接洽合作意向。
- ㊶ 王碩：〈改革開放史上的特區貨幣問題〉，《百年潮》，2008年第1期，頁47-51。
- ㊷ 〈蛇口模式是中國經濟改革與開放的寶貴結晶〉，《世界經濟導報》，1985年9月23日，第2版。

- ④⑥ 〈國務院關於批轉經濟特區工作會議紀要的通知〉(1986年2月7日)，載《中央對廣東工作指示彙編(1986年—1987年)》，上冊，頁55。
- ④⑦ 〈人民日報發表深圳市長訪問記〉，《深圳特區報》，1987年2月17日，第1版。
- ④⑨ 袁庚：〈挑戰性的年代 挑戰性的試驗〉，《世界經濟導報》，1986年5月19日，第14、15版。
- ⑤⑩ 劉國光：〈關於深圳特區的發展戰略問題(代序)——1985年4月23日在深圳市幹部會議上的報告〉，載劉國光主編：《深圳特區發展戰略研究》(香港：香港經濟導報社；深圳：深圳特區經濟研究中心，1985)，頁10。
- ⑤⑪ 梁文森：〈實現外向型經濟的主要途徑〉，《深圳特區報》，1986年1月9日，第4版。
- ⑤⑫ 參見〈國務院關於批轉經濟特區工作會議紀要的通知〉，頁54；〈谷牧同志在市委匯報會上的講話〉(1983年11月27日)，載《谷牧同志關於特區工作的談話要集》，頁88。
- ⑤⑬ 〈一九八七年經濟特區工作會議紀要〉(1987年2月10日)，載《中央對廣東工作指示彙編(1986年—1987年)》，上冊，頁291。
- ⑤⑭ 參見鄧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239。從鄧小平的談話依據，可以推導出這一結論。
- ⑤⑮⑯ 薛暮橋：《薛暮橋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頁402；326。
- ⑤⑰ 李元浦：〈鄧小平視察天津時指出 對外開放還是要放〉，《深圳特區報》，1986年8月22日，第1版。
- ⑤⑱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377。
- ⑤⑲ 谷牧：〈要認真貫徹執行「二十二條」〉(1986年12月17日)，載《中央對廣東工作指示彙編(1986年—1987年)》，上冊，頁231。
- ⑤⑳ 李灝：《李灝深圳工作文集》，頁87。
- ⑤㉑ 〈國務院關於批轉「一九八七年經濟特區工作會議紀要」的通知〉(1987年4月11日)，載《中央對廣東工作指示彙編(1986年—1987年)》，上冊，頁289。
- ⑤㉒ 李國強：〈李灝談深圳現狀和未來發展〉，《廣角鏡》，1987年6月16日，頁26。
- ⑤㉓ 〈經濟特區工作會議紀要〉(1986年1月5日)，載《中央對廣東工作指示彙編(1986年—1987年)》，上冊，頁65。
- ⑤㉔ 〈谷牧同志在全國對外宣傳工作上的講話〉(1986年11月29日)，深圳市檔案館，A1-1986-53。
- ⑤㉕ 王碩：〈1987-1994年深圳特區的發展歷程〉，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編：《中國沿海城市的對外開放》(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30、31。
- ⑤㉖ 王和平、傅建國：〈蛇口工業區政治體制改革邁出可喜步伐〉，《深圳特區報》，1986年9月14日，第1版。
- ⑤㉗ 于明濤、張根生、徐賀：〈一個辦得較好的外向型工業區——蛇口經濟發展調查〉，《深圳特區報》，1986年3月1日，第2版。
- ⑤㉘ 參見〈谷牧同志在視察深圳特區後的講話〉(1982年4月3日)、〈谷牧同志在深圳經濟特區解決電訊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1983年4月11日)、〈谷牧同志在聽取有關特區自主權和特區總目標匯報會上的講話〉(1983年4月17、18日)、〈谷牧同志在市委匯報會上的講話〉(1983年11月27日)、〈谷牧同志在經濟開發研討會上的講話〉(1984年6月4日)，載《谷牧同志關於特區工作的談話要集》，頁16、61、68、92、112。
- ⑤㉙ 〈關於深圳擬成立政協機構問題的覆函〉(1985年3月30日)，深圳檔案館，A1-1985-9。
- ⑤㉚ 〈關於深圳市設立人大和政協問題的函〉(1985年12月20日)，深圳檔案館，A1-1985-9。
- ⑤㉛ 〈關於建議抓緊深圳市依法進行人大籌建工作的意見〉(1986年8月1日)，深圳檔案館，A1-1986-44。
- ⑤㉜ 參見〈常委會議紀錄〉(1986年8月30日)，深圳市檔案館，A1-1986-2；王勇剛：〈深圳的新起點：建立開明「政治」〉，《深圳青年報》，1986年11月4日，第2版。
- ⑤㉝⑤⑳ 鄧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頁240、242；239。
- ⑤㉞ 參見錢超英：〈我贊成小平同志退休——與微音同志商榷〉，《深圳青年報》，1986年10月21日，第1版；〈本報「我贊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引起強烈反響〉，《深圳青年報》，1986年10月28日，第1版。

- ⑳ 〈特區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深圳特區報》，1987年1月18日，第1版。
- ㉑ 〈市委工作會議昨天圓滿結束〉，《深圳特區報》，1987年1月15日，第1版。
- ㉒ 參見《深圳青年報》編輯部撰寫的檢討書，〈吸取教訓 端正方向 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深圳青年報》，1987年2月6日，第1版；〈本報啟事〉（停刊整頓啟事），《深圳青年報》，1987年2月10日，第1版；王克剛：〈緊握輿論 開明報刊遭殃〉，《百姓》（香港），1987年2月1日，頁6。
- ㉓ 〈習仲勛同志在會見深圳市委市政府領導時的講話〉（1987年2月15日），載深圳市委辦公廳編：《中央領導同志視察深圳講話資料彙編》（內部資料，出版時間不詳），頁239。
- ㉔ 〈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王首道對記者說〉，《世界經濟導報》，1987年3月2日，第3版。
- ㉕ 〈袁庚暢談蛇口工業區建設成就的啟示〉，《世界經濟導報》，1987年3月23日，第3版。
- ㉖ 冷溶、汪作玲主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1191。
- ㉗ 葉永烈：《陳雲之路》（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5），頁325。
- ㉘ 錢漢江：〈深圳是創業者的樂園〉，《深圳特區報》，1987年2月27日，第1版。
- ㉙ 《深圳市長梁湘》一書認為，1990年代初有名的《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謎》一書，「要害是輕率地只看到孩子出生的喜悅，卻蔑視懷胎十月的漫長的艱難困苦。」參見朱崇山、陳榮光：《深圳市長梁湘》（廣州：花城出版社，2011），頁217。
- ㉚ 〈中央領導同志在聽取深圳市負責同志匯報工作時的講話〉（1988年2月20日），深圳檔案館，A1-1988-30。
- ㉛ 〈關於人民日報情況彙編對深圳特區歪曲報導的情況報告〉（1988年2月22日），深圳市檔案館，A1-1988-3。
- ㉜ 何博傳：《山坳上的中國——問題、困境、痛苦的選擇》（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頁133。
- ㉝ 1985年初前後，深圳特區迫在眉睫的任務之一是解決自身外匯平衡問題，所以趙紫陽有此一說。1986年中期開始，經濟特區形勢已逐漸好轉，趙紫陽對深圳特區新的一把手李灝提出了新要求。參見〈趙紫陽同志視察廣東時的講話〉，頁208；李灝：《李灝深圳工作文集》，頁175；〈萬里同志在聽取深圳市負責同志匯報工作時的插話〉（1991年1月30日），載《中央領導同志視察深圳講話資料彙編》，頁403。
- ㉞ 趙紫陽：〈政府工作報告——1987年3月25日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深圳特區報》，1987年4月13日，第1版。
- ㉟ 1987年深圳上解收入佔當年預算財政收入的22.4%，遠超1986年的9.9%。參見黃永山：〈深圳財政稅收體制分析及進一步改革的一些設想〉，載中共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編：《深圳：新體制研究——體制改革調查研究報告彙集》（內部發行，1988），頁86、87、90。另據《深圳特區報》有關文章介紹深圳特區實行外匯留存「倒二八」分成情況，深圳1988年外貿出口創匯達到18億美元，比1987年增長23%，在全國大中城市出口總額序列中，僅次於上海居第二位。1989年開始，根據國務院文件精神，經濟特區外貿出口收匯由全額留成改為「倒二八」分成（即特區留成80%，上繳中央20%，原五年特區上繳中央外匯基數的辦法停止實行），使特區與全國其他地區處於同等位置。參見《深圳特區報》，1989年1月3日、1月15日、1月27日、3月5日。
- ㊱ 趙紫陽：〈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1987年10月25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26、24。
- ㊲ 鄧小平：〈要吸收國際的經驗〉（1988年6月3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267；〈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頁372、375。
- ㊳ 傅高義（Ezra F. Vogel）著，凌可豐、丁安華譯：《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頁166。